

的編輯工作。但这个工作本身毕竟是一种资料性的工作，包括着許多具体、細碎的事务。正像編者在后記中所說的：“有些人以为，资料工作只是抄抄写写，是‘壯夫不为’的瑣事。但編者认为，在社会主义的偉大事业中，各项工作誠然有大与小、重要与次要之分，但能进行一些对大家有益的事务，切切实实地为社会主义事业添一磚一木，以助于巍峨堂殿的建成也毕竟是一好事，是一快事；而资料工作也正是研究工作的基础和必要条件”。从整体看，研究工作是社会主义的偉大事业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资料工作又是研究工作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在本书的編輯、出版的过程中，虽然主要是靠两位編者尽了很大的努力，但也取得了許多方面的共同协作与互相支持。他們是很注意依靠和发挥集体的力量的。

学习他們的旺盛饱满的工作热情和坚韧持久的工作干劲。編者基于以上的思想認識和工作精神，发出极大的工作热情与干劲。他們在解放后的长时间内，尽管本崗位的工作很忙，常常还要从事更为迫切的战斗任务，但仍能抓紧利用业余时间，甚至

在炎热的暑假期里也要紧张地突击工作，步步跟进地付出了大量的劳动，终于坚持到胜利完成全部編輯出版工作。专业的书目工作者与资料工作者又当怎样克尽职守，充分利用一切工作时间，千方百计地做好本崗位的工作呵！

学习他們的严肃負責的科学态度和实事求是、調查研究的工作方法。編者对于有关五烈士的各种资料，不仅是日积月累，而且做到了边搜集、边查訪、边核对、边考证。可以說是既作調查，又作研究。随时发现一些問題，也随时澄清一些問題。决不同于一般的有文必录，只是抄抄剪剪、拚拚凑凑，而是善于深入底里，寻找矛盾，经过分析，在不少地方提出自己的見解或写出考据性的文章，頗有独到之处，尽量避免了人云亦云，以訛傳訛。当然，在资料目录中，編者还有意識地保留了某些見解不相一致的文章，有些材料也有待作进一步核实。同时，书中不止一处提出征求各种遺漏的材料，以求更加窺其全貌与真象，并准备本书再版时另作补充和进一步地研究出一些問題。我們热切地期望着两位編者在今后的工作中繼續取得更大的成就！

探索古笈的有效工具——“中国丛书综录”

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家。在漫长的社会发展过程中，我們的祖先創造了灿烂的文化，留下了浩如烟海的典籍，这些典籍反映了我国文化学术的日益繁荣和发展。

丛书是汇集許多重要或难得的著作为一书，最便于学者閱讀和流傳。由于历代的統治者，对文化学术并不真正重視，甚或对那些不利于反动統治的著作，任意摧殘，肆意蹂躪，加以战乱水火災厄頻仍，图书极易散失，学者訪求困难，因而丛书的輯印，特別起了流通書籍、便利学者的巨大作用。

我国最早的丛书是俞鼎孙、俞經的“儒学警悟”，輯成于南宋宁宗嘉泰二年（1202）。但流傳很少，清光緒年間发现了明鈔本，至民国十一年（1922）始由陶湘刊行。因此前人考证丛书源流，每以宋左

圭輯“百川学海”、元陶宗仪輯“說郛”为祖。“丛”字的意义本是从杂、丛集，最初总是各类兼收的。到了明代，这种包罗四部的巨編，如“汉魏丛书”、“唐宋丛书”、“格致丛书”、“宝顏堂秘籍”等，有了很大的发展；同时，“子汇”、“二十子”、“古今逸史”、“五朝小說”等专门性质的丛书也不断出現；而第一部邑丛书——“盐邑志林”，亦是在天启年間刊行的；如果再加上早已存在的一姓或一人著作的合刊这类丛书，那末在这时候可算是各体具备了。由于文化学术的积累和发展，丛书到清代，特别是中叶以后，达到了全盛时期，非特具备了各种类型，而內容也愈益精粹；正續“清經解”的編纂，說明当时对經籍的整理，取得巨大的成績；“玉函山房輯佚书”、“汉学堂丛书”等的編刊，反映了輯佚工作的

兴起；由于考訂历代史志之学的远迈前代，而有“广雅书局丛书”、“史学丛书”的相继問世；由于方輿地志、域外交通新研究課題的提出，而有“麓山精舍丛书”、“浙江图书馆丛书”的先后傳布。三百多年来，自顾炎武、王夫之等学者輩出，著述宏富，他們的独撰丛书，自“亭林全书”、“船山遗书”以下五百多家，更丰富了丛书的内容，成为研究文史所必讀的著作。而翻刻古书，也利用丛书来流傳，有的注重版本，如“士礼居丛书”、“古逸丛书”，仿刻精善，如見宋元旧本的眞面；有的注重校仇，如“抱經堂丛书”、“經訓堂丛书”、“岱南閣丛书”，校勘縝密，訂正謬誤，貢獻很大。丛书发展到这个时候，各科学术的重要著作，几乎全被收入；因而从事学术研究的人，都要从丛书里采取所需用的资料，它的用处就愈来愈广泛。

目录是用来反映图书内容，便于檢寻所需图书的重要工具。因此，它随着图书的发展而发展。自清代中叶以来，丛书大盛，其专目的編纂，也应运而生。丛书目录有别于一般目录，在于它是汇刻数书为一书，不仅要反映丛书本身，更重要的还要反映它所包含的子目。顾修所輯的“汇刻书目”是第一部丛书目录，收丛书260种，以后随着丛书的不断发展，傅云龙、朱学勤、朱記荣、楊守敬、李之鼎、刘声木、孙殿起等十余家相继編撰，或是別树一帜，或是增补前修，都按分类排列，其中以李之鼎的“增訂丛书举要”为集大成，收1605种。另有沈乾一輯的“丛书书目汇编”，收2086种，則改分类为书名字順。这些汇刊目录，都是列子目于丛书书名之后，只能檢寻其所收多少书和什么书，却不能檢寻某书或某人所著书收在什么丛书里。自图书馆事业兴起后，针对这种缺点，用索引之法，編制子目索引，如清华大学图书馆輯的“丛书子目书名索引”（收丛书1275种），浙江图书馆輯的“丛书子目索引”（收丛书469种），金陵大学图书馆輯的“丛书子目备檢：著者之部”（收丛书361种）等，虽便于子目的檢索，但忽略了丛书本身的反映，仍不免有顾此失彼之病。楊家駱用丛书书名、子目书名、子目著者混合字順排列的方法，編制了“丛书大辞典”；但混合之法，既感眉目不清，又因未得遍观群书，絕大部分系据各家目录汇编，以致重复收录，存佚不分，有目无书，不能發揮正确反映图书的作用。自顾修“汇刻书目”到“丛书大辞典”都沒有

子目分类的編制。并忽于版本的考覈，实为最大的共同缺陷。同治图书馆所編的“图书总目”，将各丛书的子目与单行各书一起分类，事实上已起了子目分类的作用，但没有索引，仍不便于查寻。

我們认为：为了便于使用者掌握丛书所包含的丰富资料，丛书目录首应力求著录的正确和分类的恰当，并須做到下列三点：（1）搜罗完备，所收丛书，应有尽有；（2）便于檢查，无论从总目、分类、书名、著者，任何一个方面去檢寻，均可一索即得；（3）反映收藏情况，俾研究者因目求书，就地取閱，节省搜采时间。以此来衡量上述这些目录，显然都未达到完备的境地；而且在反动派統治时期也是絕對不可能实现的。因为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里，文化学术为极少数人所占有，图书资料非常分散，不是为官僚地主、买办资本家或学閥所壟断，就是被帝国主义者所掠夺，留在公私图书馆里可供借閱的，少得可怜，无法統一使用，故所編目录，有的只能就一館所藏，数量很少；有的看不到原书，仅凭各家著录勉强凑合。在編制方法上往往因陋就簡，欲求完备詳尽，則不逮远甚。这正是我国某些忠实于图书馆工作者所扼腕兴叹的。

（以上录自“中国丛书綜录”的序言）。

现在，上海图书馆編纂了一部“中国丛书綜录”，使上述問題基本上得到了解决。該录所收丛书2797种，均系古典文献，全书分装三册：第一册为“总目分类目录”，附“全国主要图书馆收藏情况表”；其内容包括“汇编”和“类編”两部分。“汇编”分类纂、輯佚、郡邑氏族、独撰五类；“类編”分經、史、子、集四类。通过它可以查到某一种丛书中收了哪些书；第二册为“子目分类目录”，总共著录种数三万八千八百九十一種，把将近四万种书籍的内容屬性用类名表記了下来，使讀者一看便能了解某本书的大体内容，或属于哪一个学派等等。通过它可以查到某一类中有哪些书，一本书为哪几种丛书所收录；第三册为“子目作者索引”和“子目书名索引”，通过它可以使讀者清楚知道某一个作者著有多少种书。另据上海“文汇报”的消息，中华书局上海編輯所不久还将出版一册可以查同书異名和同名異书的目录。这样，多年来我国科学研究工作者和图书馆工作者梦想获得一种簡便有效的工具来解决經常遇到的索书問題，現在由于“中国丛书綜录”的出版而变成现实了。